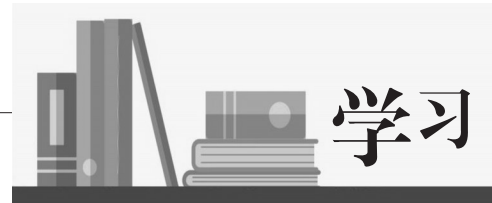


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

刘群



斯诺从他的视角,用鲜活的故事报道了当时苏区的真实情况。他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淡化了宣传色彩。他通过细节刻画,将农民对于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国民党的痛恨、红军面对封锁的顽强抵抗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读者看到斯诺拍摄的谈笑风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生活在苏区欢天喜地的儿童们以及衣着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很难相信这些人是“土匪”。从而更直观地说服受众,改观了国民党的负面宣传。斯诺对外传播共产党形象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与报道方式,对外传播要以鲜活的艺术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所蕴含的精神价值。

80多年前,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红色政权生机勃勃的崭新面貌,出版后在短短一个月后就连续再版5次,发行数超过了10万册。此后又相继被翻译成法、德、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风靡全球。

《红星照耀中国》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8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我们仍然需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回顾斯诺的延安之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一、斯诺的延安之行的背景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此后,他作为一名海员,游历了中美洲。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带上一部旧柯达相机,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驻华记者生涯。他曾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民间流传着关于红军和共产党的种种矛盾的说法。国民党宣传称,红军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但也有传说中国共产党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是穷人的救星。令斯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红军真的是国民党媒体所说的“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红军呢?

强烈的好奇心使斯诺希望自己能够亲自采访红军,了解真相。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他几经辗转,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陕北。到达之际,当地军民全城出动欢迎,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大会”。

二、斯诺的红色政权考察之旅

抵达延安后,斯诺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根据所见所闻,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故事。

(一)通过亲身体验观察红色政权

在延安采访期间,毛泽东鼓励斯诺到苏区各地了解情况,对他的采访写作从不干涉。周恩来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还为他安排了一个92天的访问日程。

在到达陕北保安后,斯诺并没有急着先去采访党的领导人和红军战士们,而是首先

开始观察,观察红军们的活动,观察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这里的氛围是他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感受过的。红军战士经常帮老百姓挑水,大家一起干农活。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都不分你我地在田边树下席地而坐、唠家常。这是他到中国8年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景象。在这里,老百姓都亲切地称红军为“咱们的红军”,称共产党为“咱们的党”。所到之处,他目睹了红军和苏区民众虽然生活俭朴却人人平等,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现象。他写道:“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通过自己的独特视角,斯诺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素材,他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使他的著作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二)通过采访调研了解红色政权

斯诺曾两次到达陕北。其间,他几乎走遍苏区,从后方到前线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从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中的工人,从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到司号兵和小勤务员,他逢人便提出问题,自由地交谈。他在苏区同军民一样吃小米、睡土炕,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采访中,为深入了解红军们的生活,斯诺还追随红军到西征前线采访。他甚至穿上红军的军装,骑着马随西征军前往陇东和宁夏,所到之处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赞,“这是一支神奇的队伍,上帝也征服不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希望、令人惊异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三)通过高层访谈深入了解红色政权

中共领导人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布置有关事宜。毛泽东尽管很忙,还是与斯诺多次彻夜长谈。毛泽东先用几个晚上向斯诺介绍中共中央的政策,之后又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人

不谈个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习惯。毛泽东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进行了仅此一次的详细叙述,其他领导人都坦然地接受了其采访。

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通过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流,斯诺看到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清苦,更多地洞察到了人民军队面对艰难困苦拥有的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深入交谈,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国的未来。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三、斯诺之行对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启示

虽然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面对的国际舆论斗争形势仍十分严峻,进行国际传播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一些美国政客妖魔化中国共产党,恶毒攻击诋毁中国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拉下新的“铁幕”。在疫情期间,部分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提出了“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在疫情发生之初,《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刊文,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当我们有效控制住本国疫情扩散、为其他国家提供支援时,这些媒体又给中国扣上“新冠外交”“口罩外交”等帽子。斯诺的传奇经历给了我们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中国许多启示。

(一)做好对外传播的组织领导

斯诺的成功传播与我们党的领导和组织是分不开的,邀请外国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对外宣工作的创新之举,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有巨大的启发意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主管采访事宜,并专门召开干部大会对采访宣传工作作出指示,毛泽东几度亲自接见外国记者,回答问题,解释党的政策。斯诺进入陕北苏区之后,周恩来专门安

排访谈行程、访谈对象和参观内容等。

斯诺离开陕北后,毛泽东还通过书信与斯诺保持联系,寄送材料,请他“收阅并为宣传”。通过借助外国记者的力量,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的真实信息传播出去,把外部弥足珍贵的支持力量充分争取过来。

(二)选择合适的传播主体和途径

当年斯诺申请到延安时,同期希望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审慎考虑,最终选择了斯诺。首先,从个人方面看,他是一个美国记者,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是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友好;其次,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撰稿,根据当时的情况,具有极好的国际公信力,所做出的报道较为客观,不带明显的情感偏向,是采访报道陕北苏区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样需要慎重考虑和选择讲述者,选择以客观的视角和友好的感情来进行宣传报道的传播者。

(三)丰富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

在延安时期,由于国际社会缺乏了解延安的渠道,许多人只能通过国民党的媒介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只言片语,而这些内容往往是具有污蔑性的。斯诺从他的视角,用鲜活的故事报道了当时苏区的真实情况。他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淡化了宣传色彩。他通过细节刻画,将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国民党的痛恨、红军面对封锁的顽强抵抗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读者看到斯诺拍摄的谈笑风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生活在苏区欢天喜地的儿童们以及衣着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很难相信这些人是“土匪”。从而更直观地说服受众,改观了国民党的负面宣传。斯诺对外传播共产党形象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与报道方式,对外传播要以鲜活的艺术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所蕴含的精神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战略与防务教课室主任)



遗嘱

刘晚霞

我曾经住在银川市步行街旁边的小巷子中,有一对夫妻在巷口摆摊修自行车、修鞋,他们都是下岗工人。由于夫妻二人待人热情,服务好、技术高、收费低,他们的小生意也越做越红火。

这两口子,早出晚归辛勤劳动,只为能够多攒点钱,在供儿子上大学的同时,也让自己安享晚年。

光阴荏苒,一转眼,儿子大学毕业了。他们的儿子看到许多人学外语、考研究生、出国留学,也想去国外深造。于是老两口拿出自己积攒的所有钱,支持儿子去美国留学。

几年过去了,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被一家外国企业录用。儿子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老两口,随后陆续给他们寄来了美金共计三万元,希望他们二老能够去美国旅游,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两口,觉得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勤俭过日子已成习惯,不舍得大把花钱。再者,如今网络这么发达,国际国内的大事天天都能知道,就不用专门出国去看看了。况且自己也上了年纪,身体也不能适应长时间的旅途劳顿,所以老两口谢绝了儿子的邀请,只把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屋翻新了一下,换了一些新家具。

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他们的儿子也已娶妻,老两口天天沉浸在幸福的日子,盼望着早点抱个胖孙子。

一天,老两口的儿媳突然打来电话,说他们的儿子出了车祸,抢救无效,已经离世。

老两口只有这一个儿子,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只是为了儿子能有出息。听到这个消息后,老两口顿时觉得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倒了!老头儿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没过多久便病逝了。

现在,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独自生活,更加孤单寂寞,伤心无助。她拿出一生的积蓄,给儿媳了五万。剩余的近十万元,请律师写了份遗嘱。遗嘱上写道:“我死后执行火葬,骨灰撒到植物园。火葬前,可以用的器官捐献有需要的人,剩余的钱捐给儿子的母校。”我看了老妇人的遗嘱后,望了望她那布满皱纹的脸。那张脸虽然饱经沧桑,但神情很安详,很满足!

安河,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和一个镇的名字。安河村因一条河而得名,这是一个在我记忆深处永远不会消失的村庄。

安河村,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东北部,紧临黄河沿岸,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庄。安河村曾属于延安市延长县安河镇,镇子坐北向南,东、西、南三面环山,有一座石拱桥连接两岸。2011年7月7日,根据陕西省撤乡并镇区划调整安排,撤销了延长县安河镇和罗子山乡,合并设立了罗子山镇。从此,安河村也就并入罗子山镇。

过去,安河是一个贫穷却又富足的乡镇。镇上除了安河村以外,还有芙蓉、克苏、山圪垛、呼家山等大小村庄26个。说贫穷,是因为那里干旱缺水、没电、土地贫瘠,村民们吃水都是靠毛驴驮到沟底下驮,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煤,生活过得很艰

苦。镇上各村的乡亲们也都本本分分,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土地刨口粮,过着地地道道的农耕生活,日子过得都不富裕。街道上的生意铺面都是山西、河南等地的人经营的。

那时候,虽然各种吃食、物资都不是很丰富富足,但大家对生活的安逸满足和幸福感来得很容易。说富有,是因为那里曾经有着热闹繁忙的生活图景。每逢集会,镇上人声鼎沸,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蜂拥而来,把自己家种的瓜果梨枣、养的鸡,还有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都拿到集上交易,换成钱又买点油盐酱醋和点灯用的煤油等生活必需品。每年七月二十三逢会,会期三天,更有周边省市县的商贩到安河镇参与商品交易。会上,山西剧团连唱三天大戏。山西大宁、永和等邻县的人和延川、子长的人也都前来采购。人山

安河记忆

杜世明

人海,叫喊声此起彼伏。街道上的百货商店、饭馆、铁匠铺、照相馆、木匠铺、理发店等铺面生意兴隆,还有骡马牲口交易场面更是壮观。

现在,在我的记忆深处,安河仍然还是那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繁华热闹的景象。记忆里的安河,总是跟儿时的供销社、染房、卫生所、银匠铺、铁匠铺、信用社、邮电所、饭馆、照相铺、理发店、学校和戏摊、粮站、院子、土窑洞以及一起撒欢玩耍过的小伙伴等联系在一起。曾经那些善良的面孔和开心的笑容,已成为永远的记忆。

如今,童年时在安河街道上撒欢玩耍、山坡上打滚欢笑、河里洗澡打闹、上马山和云坡山偷西瓜时的快乐时光,时常浮现于脑海,并挥之不去。村里男女老少十几人相跟着去马山沟里拾柴火,十里路上把一捆捆柴运回家的场景,也时常萦绕在记忆

中,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岁月流逝,如今的安河,虽然道路宽敞,可已经没有了过去的热闹。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老人都随儿女来到城里安享晚年。可在我心中,还是怀念那个曾经的安河。愿安河之水清澈长流,愿安河村依旧屹立,更愿安河古镇早日重建,早日恢复往日的繁华。



古村修辉印记

王建宏

洛川因洛河流经而得名,因“洛川会议”而闻名,因洛川苹果而驰名。

洛川大塬东西窄狭,南北宽广,东北高西南低。在大塬最南边是东西走向的石头镇和朱牛便民服务中心。石头镇东接黄龙,西邻宜君,南连白水,北靠洛川的百益和秦关。这里土地宽广肥沃,人杰地灵,曾出过许多达官显贵和文人骚客。从石头镇向西到朱牛的贫家塬村,再从西南方下沟到堡乃村,该村是洛河出洛川境之地,海拔只有650米。

洛川县石头镇修辉村坐落在石头镇向西五公里处,南北长约一公里,东西宽约300米,石头镇通往朱牛贫家塬村的县级公路在村北边经过。村子北边过公路500米是北沟,村南约500米是南沟,村东有东沟,村西是西沟。村史现在可以考证的是2011年出土的墓碑,收存于洛川县博物馆。

千年古村修辉历史悠久,村落院落鳞次栉比,井然有序。四周城墙高约两丈,南北长300多米,东西宽约200米,东西南北共开四门,城楼巍然耸立,相对呼应。城外有南、北两寺,其间八个大殿古色古香,美丽如画,阵势壮观。城内高台楼阁式的大小戏楼、大小祠堂及献殿中的雕梁画栋星罗棋布。地势北高南低,有坐北朝南砖窑六排,以家庭各成院落。

村东西两侧有约50米的碾麦场,南北大通道沿中轴线穿村而过。村南北各有一寺,名曰上寺和南寺。寺内有前殿、中殿、后殿,东西有偏殿。寺院大门朝南,拆除前一直有人驻守。村东边和东南边因地势险峻,另建有两处避险城,分别叫北城和南城。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改善住宅条件,村干部组织村民商定,并经县、乡政府批准,1968年,在村西北公路南侧的上斜地里修了第一孔砖窑,之后陆续修建形成村庄,起名下修辉。基本上于同一时期,在村东的槐树坪地里又建起一村庄,起名下修辉。下修辉村的户数和人口略多于上修辉。现在全村大约1000人,其中上修辉大部分人姓氏王,有少数人家姓李;下修辉人全王姓。上世纪80年代,由于老村居住人口越来越少,陆续拆宅还田。大小祠堂、献殿等古庙院一并拆除,只有大戏楼孤零零地立在老村还田地中。一眼望去城墙城门遗迹,还依然耸立着。

如今,年过花甲的我虽然居住在车水马龙、繁华喧闹的大都市,但时不时地想念着我生长的地方。我生命中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是在小村度过的。如今,我依然盼望那古庙宇、寺院、大小戏楼和祠堂能够恢复原貌,供今人游乐观赏。



去年十月,我满怀眷恋之情回到家乡,和父老乡亲商议重修家谱一事。当我翻开家谱认真而仔细地阅读全文后,不禁肃然起敬。原来我的家乡修辉村是一个千年的古村。透过家谱,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座壮观别致的豪门庄园。孩提时代,也时常听长者絮叨他们儿时的村容村貌,语气中充满了惋惜。这一切,更加坚定

了我参与重修家谱的信心和决心。在村里,我走访了诸多年近九旬的老人,并结合自己童年时的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续写千年古村——修辉的传奇。

滔滔洛河水,浩浩洛川塬。

如果说洛川是陕北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那么石头镇修辉村就是镶嵌在这颗明珠上的钻石!